

小引

2022 年是我的不惑之年。可遺憾的是，這些年自己卻似乎並未在通往澄明通透的道路上有所進益，反倒日漸退步，愈發惶惑：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而我們又身在何處，學術何為，文學何用？歷史與當下、夢境與現實間何以會超越時空，發生如此詭譎而真切的交錯，讓人不禁想到《哈姆雷特》中有句著名的台詞——“The time is out of joint”。多少做些歷史研究的人，或許總有一天都會發出黑格爾那樣的哀歎——「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儘管如此，人們卻依然試圖藉着一些經驗性的論述徒勞地撿拾某些「教訓」，在「以史為鑒」的幻覺中等待一個戈多，似乎非此便難以安身立命。

借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史學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 J. Geary）的話說：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工作常常（如一個歐洲學者喜歡說的）是做過去的看門狗。如果人們錯用過去，我們就得在夜裏吠叫，有時候還得撕咬，不過別指望會討人喜歡。沒人喜歡看門狗，可是看門狗很重要。

歷史學——被正確地研究、正確地使用的歷史——

是一個批判性的學科。批判性不是指說壞話，而是獨立地思考過去及其與當前的關係，且不憚於加以區分；即使社會大眾中間流行的是另一種主張，他們熱烈地想要把過去與當今聯繫起來，為正當化當今而想像過去。^①

那場戰爭雖已過去，可在這個地球上戰爭卻每天都在發生；帝國的時代似已不再，可作為一種歷史遺產，帝國的幽靈、帝國式的思維是否亦已隨之遠去？對於外在於日本的他者而言，曾發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悲劇會不會「昨日重現」，或者發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對於從事戰爭時期日本文學與思想研究的人來說，如何在過去與當下之間確立自己的位置，如何在當下的時點上重審過去，都是一項充滿着挑戰的工作，荊棘遍路，道阻且長。

我們在面向怎樣的預設讀者、以怎樣的問題意識、生產着怎樣的知識——這種將自我歷史化、相對化的自覺中所伴隨的焦灼感，時時拷問着我們的學術倫理。十多年來，我一直以戰時和戰後的日本為主要關切對象做着一些微末、瑣細的學術工作，試圖以此逼視自己的觀念死角，並經由一次次痛苦的自我否定進而檢視文學史和思想史敘事中的某些認知框架和定見。就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這一存在卻在我心中起了變化——從原初一個奇特的「認識對象」，轉變成了一套不算奇特的「發生裝置」。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前

① 帕特里克·格里著，羅新主編：《歷史、記憶與書寫》，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第3頁。

輩曾殷殷寄望於我輩年輕一代：作為一個日本研究者，好好做下去，到了退隱之年，自會有你們的一套獨到的日本觀、寫出一本屬於你們的日本論，那時你就成了。多年來，我也曾以此為志業，孜孜以求，而今終覺力有不逮，雖自知有負所期，但還是打算就此繳械投降，成為文化意義上的「日本通」之理想只能遺憾地交由其他俊彥去代為實現了。就像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在他的政治遊記中所反覆表明的那樣：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不是其種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質特徵，而是政治結構。因此有時會擔心，當日本（人）在文化、民族性的意義上在大眾文化層面被歸結為一種特異的奇觀，當明治和戰後日本崛起的過往被知識界以不自覺的、「內在於我的日本」觀念急切地理解為某種可以參照、照搬的東亞鏡鑒，並將其作為「方法」時，這種不自覺的絕對主義觀念抑或目的論指向或許都意味着某種認識論上的智性怠惰，似乎一切歷史、狀況中的疑難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刃」作為一種認識裝置若未經歷過相對化的自我檢視，我們便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卷刃」的時刻：當世人豔羨的明治維新讓日本崛起成為世界強國之時，別忘了，帝國的崩潰乃至今日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諸多病弊也都可以從 150 年前的那場政變中尋到淵源；當我們從日本人 / 日本文化中抽象出諸般特性時，也別忘了，那可能也是昭和軍國主義對外宣傳的口號和標語。——或許，我們更需要一種「不動聲色的日本研究」。

這是我的第一本評論集，其中所輯文字，雖體例參差，短長不一，但輻輳焦點處卻有着相通的問題意識，即「極端語境下的人」。我試圖在時代境況、政治境況中感知「人的

境況」，並在「極端語境」中重審「日本人論」、「日本文化論」的虛實與位相，筋力於探尋些許超越時空的普遍意義。雪泥鴻爪，小書中大部分文字是十年間散漫讀書之拾穗偶得，是從閱讀中不斷汲取學術、思想養分的欣快歷程，妄作解人之處雖是閒情餘墨亦當文責自負；但當野人獻曝，要將這些年步履蹣跚的「斜行線」奉呈於知識界時，惶恐之餘，首先要向惠我以思考契機和智識的思想巨擘、學術前賢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誠摯的謝意。而另一部分則是幾個關於「人」的小故事。人文學終不能目中無「人」，在宏大敘事之外，透過重返人事關係，從「事」的角度重新打量「人」的世界及其背後的權力構圖或許也是一條別有生趣的荒郊野徑。——就當是野狐禪的自我辯護吧。文章最初多以隨筆、評論的形態在評論類報刊發表，囿於體例之限，多未附詳細註釋與參引文獻。結集前，為便於理解，又翻檢、核實當年所閱讀的論著、史料，逐一註明引文出處，這也是要事先交代的。

王汎森曾批評說，過往的思想史研究將「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分得太開；^①加藤周一在討論「知識分子協助戰爭這一事實的內部結構」時指出：「日本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與思想是分開的。……脫離現實生活的思想，是無法創造出超越實際生活的價值和真理的。」^②思想是生活的一

①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第2-3頁。

② 加藤周一：〈戰爭與知識分子〉，收入加藤周一著、李友敏譯：《日本人的皮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2月，第199頁。

種方式，生活也是思想的一種方式，二者應該一而二，二而一，往復交織。將生活抽象化，將思想具象化，於生活與思想之間尋找接點和津樑，也是近年來我樂於嘗試的思想路徑和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學術又豈是「坐冷板凳」的事業？它本身即是光源、熱源，讓人不禁全力奔赴。

不惑之年，依然大惑存焉，沒出息。不過無妨，自欺地想想，就當是所謂的「少年感」吧。

王昇遠

壬寅人日，亦是生日，於故鄉村野間

目 錄

小引

i

上卷

誰來證明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

—— 戰爭敘事中消失的日本「人」 3

1938：「非常時期」的一場越境私奔及其文學史餘波 27

奧野信太郎：「精神故鄉」的面影 40

「正直的老鷹」與「卑鄙的鴿子」
—— 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 48

永井荷風的潔癖與復仇
—— 《斷腸亭日乘》中的「現代日本」批判與日常抵抗 59

經濟力推演、調查與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117

大佛次郎戰敗日記中的「神風」與荷風 126

麥克阿瑟的靴子
—— 「開除公職」處分與尾崎士郎的時局因應 139

帝國宣傳的莫比烏斯環
—— 戰時、戰後火野葦平的政治悲喜劇 151

戰敗日記的「讀法」
—— 兼談有關戰爭記憶的勞動分工 164



「叛逆者」的哲學	
—— 鶴見俊輔的「方法」論及其思想、政治選擇	176
弱者的抵抗	
—— 從宮崎駿的《紅豬》到雅斯貝斯的《罪責論》	194
《哈爾的移動城堡》中的「官魔」與「野魔」	205
在艱難時世中做個「真正的人」	
—— 從吉野源三郎到宮崎駿，再到我們	215
宮崎駿的終極之問：《你們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中的 道德抉擇與歷史隱喻	232
在「兩面性」認知中尋求共生與寬恕之道	
—— 《幽靈公主》中的自然觀、歷史觀與戰爭觀	243

下卷

從歷史想像東亞：走出「方法」與「特性」的迷思	261
「內在於中國」和「內在於我的中國」	
—— 近代日本如何言說中國	274
帝國的「顏面」	
—— 「日本論」的名與實	285
「明治」的幽靈及其近代後果	
—— 安德魯·戈登《現代日本史》之啟示	300
壑聲、峰影與「中間地帶」	
—— 從陳言的《萬壑有聲》到知識人行動的邊界與可能	314
猶大與總督	
—— 如何思考近代日本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	324
150 年前的那些糞便	
—— 薩義德「東方主義」的東亞射程	339
日本文學家戰爭責任研究的六個層面與未竟課題	349
「跨戰爭」視野與「戰敗體驗」的文學史、思想史意義	362



作為「反應裝置」的戰爭和作為「認知裝置」的「戰後」 —— 為日本戰爭文學研究再尋坐標的嘗試	390
「同時代集體性心情」：異態時空下的知識人、民眾與國家	407
表述日本的姿態與閱讀日本的心態	418
家史調查、歷史記憶與「全歷史」寫作 —— 中日學者三地書	428
代後記	444



誰來證明那些沒有墓碑的 愛情和生命

—— 戰爭敘事中消失的日本「人」

最近這些年，我一直在做有關戰爭時期日本文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隨着研究的推進，愈發深切地感受到，對這一時期相關問題的理解若不深入到歷史深處的細節層面、歷史敘事的褶皺區的話，往往只能看到浮泛的皮相，而看不到深層的骨相。若我們只能以一些籠統的主義、思潮、口號或印象式批評回應嚴肅的歷史、政治和文化議題，那麼除了能製造出一些迎合讀者的異域獵奇心態或民族主義情緒的奇幻效果，實際上無論在「知」還是「識」的層面上，都未必會在既有認知的基礎上有實質性的推進，我們的歷史空間想像力也不會在此基礎上有所增益。

作為大學教師，在與同學們討論戰爭相關學術議題時，我發現一些優秀的學生常會熟練地運用一些現成的理論工具和自明的後設立場參與討論，喜歡從大處着眼，侃侃而談，沒有猶疑，似乎一切都有明確的標準和尺度，而歷史語境、理論射程等都不在慮中。他們往往懶於從小處着手，人事脈絡尚未理清，結論卻早已準備就緒。長此以往，一個比較讓人憂心的後果是，儘管我們不斷生產着概念、術語、體系，歷史卻被



人為地簡化了，歷史中的「人」也因此被我們弄丟了。

所以，近年來我所做的一點有限的工作，就是試圖去發現被宏大戰爭史、文學史敘事遮蔽掉的「人」。通過搜求大量的一手文獻並進行文本細讀，以「帶有日期的判斷」^①在細節層面讀出史料文獻所負載的歷史信息，從底層世界、周邊視角重審那些我們習焉不察的「暗默知」（tacit knowledge）與宏大敘事，進而拓寬對戰爭時期日本人精神史、日本文學史和思想史的認知和闡釋空間。同時，我也提醒學生們在思考文學史、思想史議題時，能在純美的「魚缸文學史」、精英思想史之外，關注更為闊大、豐富的「江湖文學史」和更具廣泛影響力的一般思想史。^②因為這樣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文化問題，都很難「一言以蔽之」，但或許這種複雜、兩難、混沌、猶疑、糾葛、纏繞的狀態才更接近於歷史、社會與人的本真。當然，這樣的研究對研究者的語言修養、文獻功力、知識結構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是對研究者心力、耐力乃至財力的嚴峻考驗，可這些苦活、累活總要有人日積跬步地去做。

一、日本帝國是「舉國一致」的麼

看慣了抗戰劇的讀者，對所謂「日本帝國主義」的認知或許是比較臉譜化的。軍歌、櫻花、太陽旗、武士刀、滿口

① 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著，邱靜譯：《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第7頁。

② 詳見本書〈「跨戰爭」視野與「戰敗體驗」的文學史、思想史意義〉一章。

「花姑娘」的鬼子兵，千篇一律，如是而已。但實情或許並非如此。日本帝國內部權力構成極為複雜，毋寧說天皇、政府、軍部、樞密院、貴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博弈、衝突使得近代以降的日本歷史常常充滿了不確定性，最終使得帝國盛極而崩。對此，日本近代史研究者們更有發言權。這裏，我只想藉助一些文史材料，與各位讀者共窺日本帝國的內在「複雜性」。

首先，是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層面。在影視劇中，我們似乎總能看到日本帝國「舉國一致」的情景，然而事實上卻未必如此。在東條英機（1884—1948）指揮戰爭期間，曾有一股力量認為再這樣下去戰爭會走向失敗，他們希望重新組建以近衛文麿為首的內閣。其中，1940年就任近衛首相祕書官的細川護貞（1912—2005）就屬於這一派。細川就曾在他的日記（1944年10月3日）中抱怨國難當頭下日本國民與國家之間關係疏離，他們只知一味中飽私囊，而不支持國家。^❶

「近代國家一般必須依靠由國民組成的軍隊。但是，國民除了國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個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權利。所以，當國家無法保證士兵的參戰條件時，軍隊就不得不下令投降」，評論家佐高信援引了大岡昇平（1909—1988）在《萊特戰記》中的這段論述，進而指出，「日本人不承認戰爭責任，恐怕很大程度上在於自己作為戰敗方在戰後悲慘的景象和徵兵制這個體系吧。他們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覺得戰

❶ 細川護貞：『細川日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79年8月、第31—32頁。

爭不是以自己的意願參加的，而是被徵兵拉去的」。^①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就曾動過逃避兵役的小心思。從美國留學歸國後，鶴見「不幸」地通過了徵兵檢查，但他並不願踏上戰場。由於有肺結核病史，他便每天飯後長跑，期待出現咯血的症狀，如此就不必參軍了，結果卻未能如願。^②

事實上，明治以降，徵兵就一直是件讓日本官方和民間頭痛的事情。有民俗學研究指出，有些地方甚至將徵兵檢查視同成人禮，這幾乎就是一種道德綁架。儘管如此，大多數人還是會逃避兵役，一些神社和寺院還推出了專門的「逃避徵兵」的護身符，許多媽媽和奶奶都慕名前來參拜求符。由於入伍參軍的中籤率是三十分之一，大家都希望「幸而不中」，但這些真心話在村裏是說不出口的。^③記者武野武治（1915—2016）說，士兵在戰場上臨死時喊的常常是「媽媽」，而非「天皇陛下萬歲」，因為母親才是讓他們扔下武器回家的人。^④戰後曾任東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的田中正俊（1922—2002）戰時曾經經歷「學徒出陣」，他作為二等兵入伍、後轉為航空兵，在菲律賓戰場上險些喪命。他回憶自己戰時在醫院的見聞時稱：「他們 [受傷瀕死的日本兵]」^⑤最後的

① 加藤陽子、佐高信著，張永亮、陶小軍譯：《戰爭與日本人》，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10月，第43頁。

② 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小熊英二著，邱靜譯：《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第23頁。

③ 加藤陽子、佐高信著，張永亮、陶小軍譯：《戰爭與日本人》，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10月，第53頁。

④ 加藤陽子、佐高信著，張永亮、陶小軍譯：《戰爭與日本人》，北京：東方出版社，2017年10月，第90頁。

⑤ 方括號內文字為引者註，下同，不另註。